●責任編輯：文 正 ●版面設計：卓樂 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

抗戰勝利80周年 惡魔七三一 三之一

編者按 在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香港文匯報推出「惡魔七三一」系列深度調查，旨在以跨國檔案與倖存者證言還原眞相，對歷史暴行作出持續追索。報道從奉天戰俘營，歐美戰俘的恐怖記憶與俄羅斯最新解密檔案切入，首度將美、俄、日多方史料和英澳戰俘口述史及家屬訪問進行交叉比對，揭示日軍731部隊以戰俘、平民爲活體細菌實驗的鏈條，以及對美蘇發動大規模細菌戰的狂妄計劃。

歷史的廢墟雖早已沉寂，但沉默並不意味遺忘。我們相信，唯有在眞相的持續照耀下，才能讓暴行永不重演，爲逝者爭取公義，爲後人守護和平記憶。

●歐美戰俘在奉天戰俘營的合影。 UNIT 731 紀錄片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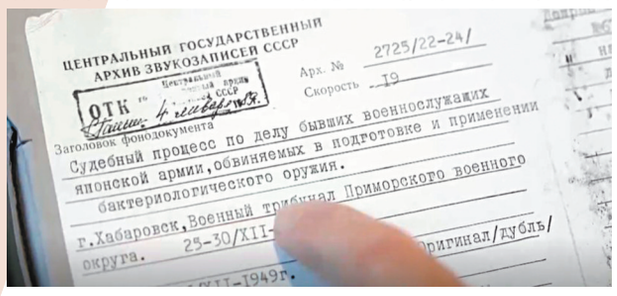
才逃過巴丹死亡行軍 又入七三一魔窟

歐美戰俘淪日軍小白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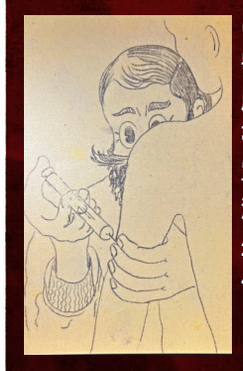
調查報道 ……（1942年）「12月17日，2名美國人死在醫院」；「18日，4名美國人死在醫院。150名戰俘從釜山運達，下船時已有42人死亡，一名美國軍官和109名『士兵』被送往醫院」；「19日，2名美國人死在醫院」；「20日，6名美國人死在醫院」……（1943年）「2月15日2名美國人死在醫院，日本人對屍體進行了解剖」；「2月23日，105天內死亡186人，全是美國人」；「3月8日，123天內死亡194人」；「6月4日，日軍進行第3次醫學調查。但醫療隊好像並不太熱衷於如何把戰俘的病治好，並詢問了很多奇怪的問題，比如戰俘們的種族背景等」；「8月6日，已有206人死亡」；「11月21日，死亡人數超過230人」……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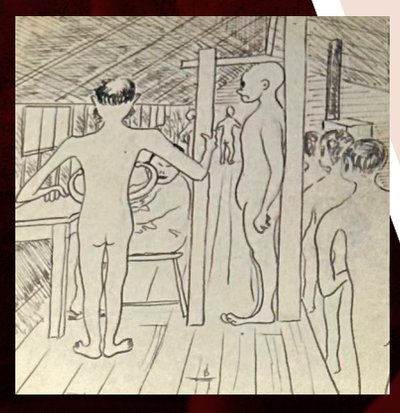
●柄澤十三夫在伯力審判中承認731部隊用美國戰俘做人體實驗。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翻拍



●蘇聯伯力審判文件。俄文內容為：蘇聯中央國家錄音檔案館，對被控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原日本陸軍士兵的審判。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翻拍



●1475號戰俘威廉·克里斯蒂·沃特克在戰俘營中所作漫畫：日本醫生在給患病的戰俘「注射」。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在1475號威廉·克里斯蒂·沃特克的畫作中，戰俘們正排隊接受「體檢」。據此後曾回訪中國的許多戰俘回憶，他們很多人都認為日軍在美軍戰俘身上做了細菌試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英國陸軍軍械部隊少校羅伯特·皮蒂（Robert Peaty），偷偷地記錄下1941年底至1945年中，美國戰俘於侵華日軍奉天戰俘營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在被關押在該戰俘營的兩年零九個月中，被編為24號戰俘的他，要冒很高的風險將紀錄謹慎藏匿，即便如此仍有部分章節因被日軍發現而被銷毀。但這本《奉天日記》是指控日軍違反日內瓦公約，於奉天戰俘營虐待戰俘、利用戰俘供日軍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為數不多的，來自於受害者視角的直接史料。

日軍醫曾親口承認來自七三一

1945年獲救的奉天戰俘營倖存者、1178號英國戰俘羅納德·喬伊（Ronald Joy），在1980年因心臟病過世時，年僅59歲。其子艾倫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特別提到了父親在奉天戰俘營中被打「疫苗」的事件，儘管這些疫苗當時被日軍稱為為應對流感和傷寒。「在另一位奉天戰俘亞瑟·克里斯蒂（Arthur Christie）的《肩胛骨任務》一書中有一個附錄，其中包含一個我認為十分全面的注射清單。」

在艾倫提供的附錄中，亞瑟·克里斯蒂根據喬治·岡寧和「努基」·埃克斯的記錄，羅列了自1943年1月30日至1945年9月5日，盟軍戰俘18次接種和體檢紀錄。除最後一次被艾倫認為可能是美軍接種的鼠疫和傷寒疫苗外，其餘則被日軍聲稱為傷寒、副傷寒、痢疾、霍亂以及未具名針劑。從已有內容上看，不論接種周期間隔、計量、甚至種類反覆重疊等情況均存疑點，「令人疑惑的是疫苗的預防注射，英軍每7年一次、美軍每5年一次，而我們接受疫苗的注射，那個真的是疫苗嗎？」亞瑟·克里斯蒂反問。

事實上，原美國戰俘羅伯特·布朗的戰後回憶可以解開亞瑟·克里斯蒂的疑問，「在到達奉天不久，有一批日本醫生來到戰俘營，給戰俘注射疫苗並編出號碼，但是不久後很多人死去，一位叫大木的日本醫生救了我，許多年以後，他告訴我他是731部隊成員。」

美解密檔案質疑「治療」目的

於2003年解密、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奉天戰俘的經歷》文件，是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戰後調查小組對瀋陽盟軍戰俘營發生的事情進行的詳細調查記錄。這份調查也對日軍對盟軍戰俘的醫療行為提出質疑：「有瘧疾症狀的人必須上報，日軍會給他們（戰俘 編者註）檢查體溫和血液，並給他們一個卡片，記錄他們每隔一天取奎寧的情況。具體用法是：前3天每天15粒，接下來的10天每天9粒，後10天每天3粒，作為一個療程。但通常兩三周後，病人又出現症狀，便需重複上述療程。這與美國的治療方法相比很荒謬，但日本人對其他病也用類似方法治療。」文件說，「可見，日本人對戰俘的『治療』目的並不是徹底治癒，更像是利用反覆發病了解目標人種對傳染病的抵抗力。」

死亡率逾納粹集中營三倍

據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史料顯示，從1942年11月11日到1945年8月20日，奉天戰俘營先後關押了2,000多名美、英、加、澳、荷、法國戰俘，其中很多美國戰俘是日軍巴丹死亡行軍的倖存者。此外，還包括香港第21任總督楊慕琦等至少16名高級軍、政官員被單獨關押在奉天戰俘營第二分所，被當做政治資產。

長期從事戰俘歷史研究的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副主任研究館員李卓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其他戰俘除了被挑選進行人體實驗外，還要進行高強度的體能勞動，飽受飢餓、疾病和毒打，這導致大批戰俘死亡。據公開數據，在奉天戰俘營，約16%的戰俘在關押期間死亡，其中美國盟軍戰俘研究中心確認至少有258名美國戰俘死亡，遠超二戰期間德國納粹戰俘營英美戰俘5%的死亡率。

美俄檔案證日用盟軍戰俘人體實驗

據美國國家檔案館檔案，1943年2月1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731部隊下達了一個特殊作戰命令暨「關總作命丙第九八號命令」，要求迅速派遣將校5名、下士官5名、兵10名共計20名人員攜帶器材到達瀋陽盟軍戰俘營「進行慢性痢疾患者的菌檢」。731部隊「工作小組」於2月14日抵達奉天戰俘營並建立了「工作場所」。次日便對1,000多名盟軍戰俘進行逐一「體檢」。在此後的「工作」中，上述小組還定期對戰俘進行抽血和頻繁注射「疫苗」，很快便有大批戰俘死亡。

俄羅斯國立音像檔案館保存的伯力審判資料，也對日本關東軍第731部隊用盟軍戰俘進行人體實驗等犯罪行為進行了佐證。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蘇聯濱海邊區特別軍事法庭對21名細菌戰和人體實驗有關聯的日本戰犯和證人進行審判。

據731部隊第四部少佐柄澤十三夫的審判紀錄顯示，1943年初，湊正雄前往瀋陽軍醫院，探望正在養病的柄澤十三夫。其間湊談及自己正在瀋陽研究美國戰俘對傳染病的抵抗力問題，「湊是由第731部隊專門派到盟軍戰俘營考察盎格魯-撒克遜人對於傳染病的抵抗能力的。」柄澤十三夫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湊正雄是731部隊霍亂班班長，是派往奉天戰俘營「工作小組」的成員之一，《美國士兵的血液特徵及對傳染病的免疫力》便是其於1943年完成的研究。

●圖為二戰期間，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的營房。 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供圖

以俘養戰的奉天戰俘營

話你知 奉天戰俘營其主營區，位於城東關外（今遼寧省瀋陽市大東區珠林橋地區），包含「囚營區」和「主勞役區」兩大區域。其中製造兵工器械與礦產機械的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是歐美戰俘最早投入工作的場所。此外還設有兩個分戰俘營（日軍稱「第一分所」、「第二分所」），分別位於舊吉林省的鄭家屯（今吉林省雙遼市）和西安縣（今吉林省遼源市）。1944年，日軍於瀋陽主營先後設立了三個派遣所，分別位於「滿洲皮革株式會社」（今瀋陽變壓器廠部分廠區），「滿洲帆布株式會社」（今瀋陽市北站省快速客運站原址），以及「中山製鋼所」。此外，還有一處特殊俘虜站，地處主營區附近，單獨關押二戰後期（1945年前後）美國空襲奉天時被擊落的跳傘飛行員。

●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中，復原後的戰俘營房內景。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供圖

東方奧斯維辛開出的跨國友情之花

「英美戰俘個子都很高，可個個瘦得脫了形，衣服破破爛爛的。」中國老人關德全揭開了被喻為「東方奧斯維辛」的傷痛記憶。「老先生可能是最後一位健在的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的歷史見證人。」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副主任研究館員李卓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說。

1944年，被強行送到瀋陽（奉天）日本工廠「滿洲帆布株式會社」當勞工的關德全年僅14歲。也是這段經歷令他遇到了日軍從東南亞戰場俘虜的盟軍戰俘。

日本人對戰俘勞役的管理十分嚴苛。關德全的記憶中，日本守衛不允許勞工之間相互交談。缺衣少食已是常態，高壓下的看管、近在咫尺的死亡更令他們始終處於恐怖之中。

「我與盟軍戰俘的友誼是從戰爭勝利之後開始的」，他親眼見證了曾經兇神惡煞的日本看守淪為階下囚，在盟軍士兵的監督下勞動。「第一次見到駕駛B-29轟炸機的美國飛行員，他們衣服上縫着寫有『我是美國人，希望得到你的幫助』的漢語布條。」老人回憶起與美國友人的相處，他們一同在戰俘營裏看演出、電影，甚至被邀請到營房裏看畫報、吃飯、洗澡。之後，關德全和陳文奇還帶着美國朋友遊覽瀋陽的名勝古蹟。不到兩周的時間，便跨過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威廉姆斯、斯道、金……」熟悉英語、日語兩國語言的他極力回想曾一起慶祝勝利的戰俘名字。

●二戰期間曾與盟軍戰俘共同服勞役的中國勞工、現年95歲的關德全。受訪者供圖

戰俘營的死神醫院

特稿 1982年和1986年，美國眾議院分別舉行了兩次退伍軍人事務部小組委員會會議，多名歐美戰俘回憶有關日軍於奉天戰俘營中進行人體實驗的目擊與經歷，上述已解密的會議文件讓人不寒而慄。這是日軍731部隊在華進行人體實驗首個被公開的有盟軍戰俘親述證言的官方紀錄。

日軍解剖戰俘遺體取器官存樣

「1943年初的一個早晨，我的身體狀況相當不好，但不敢到『醫院』去，因爲去的人誰也回不來。我到放置屍體的小屋去，那裏堆積了大約三四十具屍體，足部都繫着號碼籤。日本人讓我把二三具屍體搬到日本『醫生』處。他們都戴着防毒面具，我和另一個人將屍體放到解剖台上。然後，他們切開屍體的肚子，將手伸入深處，掏出胃、膽、小腸等器官，並取出肝臟樣的東西和肺什麼的。然後，切開頭，取出腦子的一部分。」編號1183號、原英國戰俘傑克·羅伯特回憶說。

曾被日軍指派配合「醫療隊」工作的編號843號原戰俘詹姆斯·弗蘭克也回憶說，日本人讓他從小屋一個接一個地搬運出屍體，擺放在解剖床上，他親眼看見這些屍體的器官被摘除放進了特殊的容器裏，容器上還標上了戰俘號碼等詳細紀錄，最後用卡車運走。不久又一些戰俘被挑選出來做測試……

用羽毛傳播病菌感染戰俘

日軍細菌試驗的手段極其隱秘。編號968號的原美國戰俘托馬斯·喬治·雷格斯回憶稱，一天晚上他正在發高燒，一個日本醫生前來要求他躺在床上，稍後把一個羽毛插入了他的鼻孔。但自那以後他一直病魔纏身，雖然戰後無數次問診卻始終找不到病因。美國戰俘格雷戈里·羅德里格斯則回憶，「日本人常把羽毛放在我們鼻子底下。」而當他們收到紅十字會包裹時，裏面的食物上也會多出各種顏色的羽毛。直到1947年生物武器專家諾爾伯·菲爾在東京對話多位前731部隊成員，這種利用羽毛傳播疾病的細菌實驗方法才被披露：不同顏色也代表着沾染不同細菌。

原美國戰俘格雷格·羅德里格斯則證言，戰後數十年中，總會莫名其妙發燒、疼痛和勞累，他每年要去退伍軍人管理局醫院很多次。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葉，醫生才確診他得了周期性傷寒，並在他的血液中找到大量的傷寒桿菌。

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舊址陳列館副主任研究館員李卓然認爲，圍繞日軍對戰俘進行的細菌實驗，還有更多未解之謎值得深入研究，「日軍把這些細菌實驗的研究成果都用於哪些方面？是否都用於戰爭？戰後是否應用到某些行業？其他盟軍戰俘營是否也遭遇過日軍的細菌實驗？」一系列問題都值得關注。

●埋葬死亡戰俘的戰俘營墓地。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翻拍